



未名社科·传播政治经济学译丛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

真实世界里的虚拟工作

[英] 乌苏拉·胡斯 (Ursula Huws) 著

任海龙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

真实世界里的虚拟工作

〔英〕乌苏拉·胡斯 (Ursula Huws) 著
任海龙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8-441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真实世界里的虚拟工作 / (英) 胡斯 (Huws, U.) 著; 任海龙译.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6

(未名社科·传播政治经济学译丛)

ISBN 978-7-301-18867-5

I. ①高… II. ①胡… ②任… III. ①传播学:政治经济学—研究
IV. ①G206②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1632 号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Ursula Huws

Copyright 2003 by Monthly Review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书 名: 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真实世界里的虚拟工作

著作责任者:〔英〕乌苏拉·胡斯 著 任海龙 译

责任编辑:谢佳丽(xiejiali.com@hotmail.com)

封面设计:春天书装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8867-5/G·3115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65016

印刷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0.25 印张 166 千字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译丛总序

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

丹·席勒(Dan Schiller)

作为这套传播政治经济学译丛的学术顾问,我们非常珍惜通过译丛的出版与中国读者进行知识与思想交流的机会。在此,我们要阐明,我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情有独钟。而让中国读者更易于接触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中一些开创性的著作,也能鼓励更多中国学者以独特的方式创造性地改进及扩展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并开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这种想象及期待或许并非遥不可及。事实上,中国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这次能有机会扩充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中文文献,要归功于北京大学出版社,还要归功于赵月枝和曹晋两位教授,她们在开拓出版译著所必需的公共知识空间及提供物质资源方面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对此,我们深表感谢。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感谢你们——我们的读者,我们真诚地邀请您和我们一起为丰富及发展传播政治经济学而共同努力。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正是这些权力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构建了包括传播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的生产、分配及消费。这一定义表述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因为它使我们关注传播业是如何运作的。比如说,传播产品如何从一系列生产者如电影制片厂,转移到批发商、零售商及消费者手中,随后,消费者的购买、租赁及注意力等信

息又反馈到生产环节,从而形成新的生产过程。但是,比起这套标准的商学院课程表述,政治经济学更深刻。这是因为,如果用最普遍且最具有概括力的定义来表述,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社会生活中的控制和生存。控制特指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个体及团体成员的内部组织,而生存则意味着他们通过何种途径来创造社会再生产所需的物质。控制过程大体是政治性的,因为它们形成了一个社群内各种关系的社会性组织;生存过程则主要是经济性的,因为它们涉及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我们需要将这两方面共同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理解。

既然要在历史背景下思考控制和生存,政治经济学就始终将社会变迁与历史转型作为首要研究目标。对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家来说,这意味着全面认识资本主义革命,即由以农业劳动为主要基础的社会向商业、制造业转变,直到工业社会的巨变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对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来说,这意味着考察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机制和审视资本主义与其他形式的政治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理解最终使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变迁过程。

19世纪末,正统经济学开始凝聚力量,反对政治经济学,它忽视历史和社会变化的动态过程,将政治经济学转化为经济学,使其能像物理学一样能对自身领域的现象和问题提出概括性的静态解释。正统经济学能够精确说明购买者和销售者如何合力在市场上制定价格,但是,它无意展现那些价格确定背后更广泛的社会及经济变化过程。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家恪守与正统经济学相抗衡的各种非正统立场,仍然秉持古典政治经济学立足社会变迁和转型的研究传统,关注着当前诸如工业经济向服务或信息经济转变的这些领域。目前,对大众媒介、信息及传播技术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因为这些研究领域所涵盖的产业是构成当今政治经济的主要力量。

政治经济学的另一特点是其审视社会整体的旨趣,即它对构成社会关系整体的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等各方面的关注。基于亚当·斯密所处的年代,他对社会生活的理解没有局限于如今学科之间清晰的学术界限。随着马克思、制度经济学、保守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相继出现,政治经济学始终如一地通过解释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及二者与更广泛的社会及象征领域活动之间的关系,坚持了政治和经济间的整体性。政治经济学者想探究的问题是:权力和财富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它们是如何构建并形成我们当前的大众媒介、信息、文化和娱乐体系的？

政治经济学坚持道德哲学，热衷于研究建立社会行为的价值及指导人们努力改变社会行为的道德原则。对亚当·斯密而言，正如他在《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所言——他对此书的喜爱胜于更著名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道德哲学意味着理解诸如私利、物质主义、个人自由这些推动商业资本主义崛起的价值观念。而对卡尔·马克思来说，道德哲学意味着两种力量之间持续的斗争：一方面是实现人类劳动中个体和社会价值的驱动力，另一方面是将人类劳动简化为适于销售的商品的推动力。当代政治经济学在道德哲学上主张将民主推及至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即除了政治上保证人们的参政权之外，还须将民主延伸至经济、社会及文化领域，要求实现收入的平等、普及教育，让公众参与各种形式的文化生产，并确保他们有权力自由表达和传播个人观点和意见。

承袭上述各方面的民主要求，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核心特征在于其社会实践性，即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性。特别需要明确指出的一点是，与传统的倾向于将研究领域与社会干预相分离的学术立场相反，但与古代对当权者提出劝告和建议的实践传统一脉相承，政治经济学者们坚持视学术生活为社会变革的一种形式，视社会干预为知识的一种形式。在如何进行社会干预方面，政治经济学家有根本分歧。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认为打开下水道允许未经处理的污水溢满街道是进行人口控制的一种方式，而马克思却号召劳工通过革命实现自身的价值。尽管如此，政治经济学者一致认为，割裂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关联是人为造成的，必须打破这种格局。

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取向容纳了很多不同学派的思想，这确保了观点的多样性及内部争辩的活跃性。可以说，如何回应以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了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思想分界线，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一方面是当前作为一门学科的经济学，它将个人作为分析的主要单位并视市场为社会的主要结构，二者通过个体在市场上对需求的表达得以结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研究路径将政治经济学对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及实践(即改变世界所需的思想与行动的一致性)的关注撇在一边，将政治经济学转变成一门基于用数学语言描述市场行为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的经济科学。在人们广义上理解的新古典经济学，或者简单来说在当下居主导地位的经济科学视角中，劳动被简化为一个与土地、资本一样的生产要素，其价值只是体现在其生产力

或它在提高终端产品市场价值的能力上。

另一种回应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的研究路径反对上述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他们坚持关注历史变迁、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及实践性。有很多不同学派的学者推动了这一政治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保守主义者试图取代市场个人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赞同社会干预但主张将社区的地位置于市场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则使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劳动及斗争回归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议题。基于这些视角的观点陈述，形成了当下广泛而复杂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表述。

尽管主流经济学在学术及政治谱系中处于中间及中间偏右的位置，但是，以约瑟夫·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这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经济学却与传统经济学的观点有所不同，因为他们主张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推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以扩展个人自由。制度经济学在政治谱系中占据中间稍稍偏左的位置，认为受制度及技术限制而形成的市场有利于那些规模和权力较大的公司和政府对其进行控制。阐述这方面观点的例子是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著作，他的主要观点来自于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思想。制度学者创建的分析框架被用来研究大型传媒企业如何能够控制大众媒介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从而限制了媒介内容的多样性。这些分析尤其关注这些媒介集团是如何将挑战迎合商业主义的观点排除在生产和销售之外的。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包括后福特主义、世界体系理论、劳动过程理论以及参与全球化问题争论的各派，它们继续将社会阶级置于问题分析的中心，主要致力于解释资本主义、劳动的自动化和去技术化，以及国际劳动分工的变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最后，社会运动也促成了它们各自的政治经济学分支的产生。这方面的代表主要有：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关注父权制在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存在和对家庭劳动的忽视；生态政治经济学，聚焦社会行为与有机生态之间的关联；还有一种政治经济学把社会运动分析和意大利自主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传统熔于一炉(Mosco, forthcoming)。

传播政治经济学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北美的出现与三个复杂的历史发展背景相关：其一，多元化的传播产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迅速扩张；其

二,这一产业随后的跨国发展,并因此在强劲的去殖民化社会背景下引发了其他国家对这一发展趋势的政治回应;其三,信息和传播在全球整个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发挥的日趋核心的关键作用。

在美国,传播产业的发展不仅包括新闻及电视,也包括以电影、音乐、广播、电话为基础的新型大企业。这些传播产业典型的所有权及控制形式是怎样的?现代传播机构是如何组织的?它们的社会功能和机构目标是什么?它们的雇佣机制和劳工的劳动实践是怎样的?如何决定生产此种形式而非彼种形式的传播产品和服务?传播资源在全社会中是如何分布的,且如何解释这些接近和使用传播资源的形态?传播中的控制体系如何重新调整国家和社会中的制度性决策并与之紧密关联?当前的传播机制是支持政治自由、文化发展及经济福利抑或不支持?当代传播在威权国家的兴起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意识形态角色?随着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这样的学者在20世纪中期开始探讨上述重要问题,他们成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先驱。

还有一些亟待探讨的问题很快也浮出水面,随之构成了反思及争论的第二个历史机遇。与二战后早期去殖民化历史过程同时发生的历史现实是:以美国为基地的传播工业实现了跨国发展,并因此引发了其他国家对这一发展趋势强有力的政治回应。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宣称要争取民族自主性的国家倡导成立了不结盟运动,由此推进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斗争,这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政治目标和富有活力的新研究议题,即传播在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全球资本主义重组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在对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进行新形式的控制过程中,传播和文化是如何被牵涉其中的?应采取何种措施重新纠正国际信息流向不平等的现状?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北美的政治经济学家如赫伯特·席勒(Herbert I. Schiller)等与来自欧洲及世界南部地区的传播学者相呼应,对主流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批评。起源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及发展主义理论试图使传播成为解释发展的一种视角,以契合占主导地位的学术和政治利益。发展主义理论认为,媒介是一种资源,应当与城市化、教育及其他社会力量一起共同相互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社会及文化的现代化,因此,媒介的成长可以被视为衡量发展的一个指标。汲取了国际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潮的若干养分,其中包括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政治经济学家开始挑战发展主义模式的基本理论前提,指出该理论是技术决定论,忽视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忽略了第一世



界和第三世界各自内部及相互间存在的多层社会阶级关系(Pendakur 2003; Zhao 1998)。

政治经济学家详细阐述了取代现代化理论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证实存在一系列作为跨国公司和国家权力马前卒的结构和实践。具体而言,将美国制作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倾销到刚独立且贫穷的国家,不仅削弱了这些国家本土化生产新闻和娱乐节目的能力,而且还形成了文化和信息从中心流向边缘的单向传输路径,当这些国家引进商业媒介体系后,消费主义文化的培育代替了其他的优先发展目标,即使人们普遍享有充足的食物、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此外,消费主义本身也产生了破坏生态及文化的负面效应。在发展被美国精英和跨国公司所掌控的超国家的传播新技术,尤其是人造卫星的计划过程中,这些刚独立且贫穷的国家的主权遭到系统性践踏。而通过电脑传播系统实现的跨边界数据传输则更进一步使大公司的利益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由于传播秩序的分布有利于西方国家,因此,全世界公众看到的是被扭曲的贫穷国家和人民的形象。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在教育过程中接受的是一种既定的美国式的假设,即私人所有且受广告资助的媒介应当主导所有形式的公共传播。图绘跨国传播企业的发展、权力以及与美国政府间亲密的关系,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个重要且持久的研究焦点。此外,资源再分配及去军事化也是其研究关注的重要方面。

由于文化帝国主义论说有强大的解释力,而且日渐成为国际辩论中用以分析问题的标准,它们不久便引发了反弹。这些反弹既表现在政治经济上,也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任总统期间,美国在财政上停止资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为该组织处于有关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问题争论的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现代化理论家试图通过重新聚焦电信及电脑新技术来修正他们原先提出的发展模式,宣称这些领域为原来的模式提供了新的认识。当大学研究人员极力宣称,信息和传播技术将消除全球贫困、不平等以及被支配的现状之时,也是他们的研究得到如世界银行等多国机构资助之际。

对此,世界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学家再次进行了回应,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信息和传播技术在全球劳动分工重新整合中的重要作用,这构成了传播思想史中的第三个关键时刻。起初,研究人员认为劳动分工主要表现在地理上,无技术含量的劳动集中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半技术和较复杂的组装劳动分布在半边缘的社会,而研究、发展及战略规划局限于第一世界国家的公司总部,而这正是大宗利润流入的区域。最新研究表明,

阶级分化超越了地理界限,就不断发展的国际劳动分工而言,核心问题在于跨国公司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不断增长,它们掌控着能超越传统时空限制的新技术(McKercher and Mosco 2007; Pellow and Park 2002; Schiller 1999; Sussman and Lent 1998)。

事实上,劳动分工的转变(我们应该补充一个方面,即劳动过程的转变)隶属于另一个涉及范围更广的转型,即传播和信息在整个全球资本投资及利润生产过程中起着越来越核心的作用(Schiller 2007)。传播和信息在经济方面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和知识的修订。在早期研究的基础上,传播政治经济学开始研究传播机构,主要是商业和国家政策部门与更广阔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间的整合,证明新的信息和传播系统在推进自由化、商业化和私有化的新保守主义议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未名社科·传播政治经济学译丛》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反法西斯主义的严酷政治中孕育而生,在争取国际信息新秩序的斗争中扩展了分析触角,在系统地关照数字资本主义的现实中更新和完善了自身的理论框架。我们选择的启动本翻译系列的几部著作体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上述三个构成侧面。

达拉斯·斯麦兹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讲授了第一门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并在加拿大的里加纳大学和西蒙·弗雷泽大学继续推进这一研究传统。他的生活和学术历程始于20世纪中期的反法西斯主义年代,历经二战后争取国际信息新秩序的斗争后,一直延续至20世纪90年代我们所身处的信息资本主义时代。在研究取向上,他一直恪守政治经济学长期关注整体性的传统,关注传播在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及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的角色,并借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美国、加拿大、智利、南斯拉夫及中国的传播问题。此次有机会将他的杰作《依附之路》(*Dependency Road*)译成中文,实在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作。

另有两本被挑选翻译的著作分别是我们两人的个人专著。《数字化崇拜》(*Digital Sublime*)一书从批判的角度分析了后工业主义理论的兴起和这一理论迷思在围绕信息和传播重建起来的政治经济中的作用。而本书最强有力的分析也许是,这一理论迷思如何掩盖了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事件,即纽约世贸中心的兴建这一原初数字资本主义光明前景的象征最后成为了“9·11”事件中最主要的攻击对象。《传播理论化》(*Theori-*

zing Communication)是一本主要对美国和英国的传播思想史进行系统追溯的研究著作,它在视域更广阔的分析框架中勾勒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轮廓,通过对不同时期传播理论发展的梳理,本书强调了劳工和传播之间的复杂关联。

在《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一书中,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S. Herman)和诺曼·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详细阐述了影响力甚广的“宣传模式”理论,即控制和资助媒介的利益团体——主要是政府机构、广告商、企业和国家的新闻来源——如何制造日常新闻。通过在国际新闻领域里大量详细而广泛的个案分析,两位文著颇丰的学者展现了“宣传模式”理论的分析力量所在。

乌苏拉·胡斯(Ursula Huws)的著作《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Making of a Cybertariat*)关注当下世界的劳工问题。必须强调指出的一点是,对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很多作者而言,资本最主要的含义不在于金钱或者说是一种投资的能力,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工资劳工和资本之间形成的阶级关系。在快速重建全球市场体系的变化大潮之中,这种阶级关系如何发生了改变?对胡斯来说,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关注社会阶级,还要关注社会性别关系。她的这本新著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树立了一个新的学术标杆。

这五本著作应该有助于引领中国读者了解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核心观点和主张。我们期待有一天,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做出贡献的英美学者会大声疾呼,要将与他们学术思想产生共鸣的中文著作译成英文。

罗慧 赵月枝 译

参考书目:

- McKercher, C. and Mosco, V. (eds.) (2007).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anham, MD: Lexington.
- Mosco, V. (forthcom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Enduring Issues, New Connections*. Second revised edition. London: Sage.
- Pellow, D. N. and Park, L. S. (2002). *The Silicon Valley of Dream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Pendakur, M. (2003). *Indian Popular Cinema: Industry, ideology, and conscious-*

ness. Cresskill, N. J. : Ablex.

Schiller, D. (1999). *Digital Capitalism: 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Schiller, D. (2007).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ussman, G. and Lent, J. A. (eds.) (1998). *Global Productions: Labor in the making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Newbury Park, CA: Sage.

Zhao, Y. (1998).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序

科林·利斯(Colin Leys)

每当有新鲜的理念注入社会科学领域时,都值得我们衷心庆祝,而将乌苏拉·胡斯(Ursula Huws)的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介绍给广大读者则恰好是这样一个值得庆贺的时刻。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方面有众多知识分子投身于“文化主义”(culturalism)和后现代主义研究,更不要提“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的枯燥残渣,而另一方面胡斯则对商品化(commodification)进程发展出一套独一无二的分析,以极富创造性的方式将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融合在一起讨论。在工作和技术变革研究领域,她早就在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中建立起了权威声望。她的研究本应该重新振奋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激发对工作环境、市场、商品化和技术变革的新研究,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她的文笔清晰聪敏,涵盖话题广泛,因此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开始可能会让人困惑。其实,主要原因是她的研究工作很少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胡斯开始写作生涯时,是出版业的一名工会活动家。当时她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激励广大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女工,因此文章语言清晰明白,能够让工人们看懂。这种写作背景让她后来的理论文章非常简单易懂,读起来很轻松。下面就是胡斯写作风格的一个例子,权做开胃之用。这一段讨论的内容是,在“失重经济”(weightless economy)的拥趸看来,一件产品的价值并不是产品制造者的劳动创造的,而是生产的资助者带来的:

1993年……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仅靠允许耐克(Nike)使用他的名字和肖像……来推广产品就赚了2000多万美

元——这笔钱比印度尼西亚生产 1900 万双耐克鞋的劳工成本总量还要多。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最后一只鞋之所以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可以归功于制作劳动，是因为对弱势工人群体的超级剥削；但“新经济学”(new economics)则完全让工人群体消失不见。可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分工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新的变化，可以将它视为过去至少一个半世纪以来生产过程不断演化的延伸。迈克尔·乔丹挣的钱也许要多得多，但他对最终产品价值的贡献在类别上其实只是相当于世纪之交时出现在皮尔斯香皂(Pears Soap)广告中的那些小女孩的贡献，或者就好像王室贵族对橘子酱产品做出官方首肯，允许厂商使用其纹章一样。(第 9 章《物质世界：失重经济的神话》)

胡斯认为，女性问题的根源来自于资本主义不断将烹饪等传统的劳动行为商品化。首先将其变形为有偿服务，然后最终被可大批量生产的有形产品取而代之，同时又将剩下的劳动(自助银行、购物等)转移给消费者，而女性作为工人和“消费者”在每一个阶段中都承受了大部分成本。

胡斯自己也意识到，她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将哈利·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对工厂劳动的著名分析放到了家务劳动上：“工作的降格”(degradation of work)也适用于家务活。但她总是将问题放在更大的背景下去考虑。比如有一位身在美国密尔沃基或英国伍尔弗汉普顿的母亲，虽然用着自动化的洗衣机和微波炉，而花在干家务活上的时间却比她祖母在这些电器还没发明时更多，而另一位身在马来西亚的女性在超级剥削下曾为那台洗衣机和微波炉制作计算机芯片，在胡斯眼中，这两名女性是有关联的。依照同样的逻辑，她也看到，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在英国纽卡斯尔或加拿大新不伦瑞克呼叫中心的一位工作辛劳、薪水微薄的女工很可能面临着失去工作的危险，而这份工作则会转移到印度一个呼叫中心某位薪水更低的女性手中。

以上这些例子都不是随机胡乱抽取的，都是取材于乌苏拉·胡斯领导的大量调查研究，涵盖面之丰富、过程之复杂几乎无人能及(请登录 www.analytica.org.uk 查看完整清单)。正是通过对全球商品化背景下人类劳动不断演变的新形式的情况及其关联性的实证研究，她才能够如此迅速准确地揭穿 20 世纪 90 年代股市繁荣时期“失重经济”鼓吹者的谎言。

胡斯另外一项重要研究主题与商品化也有联系，她研究了办公室内信息通讯技术在劳动过程中的应用。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办公室劳动或

文书工作的从业者大多数都是女性。数码信息技术普遍得到利用,同时新通讯技术允许任何“可数据化”的工作被外包到世界任何地方并越来越多地由机器完成,因此这种转变带来的冲击主要影响到女性(当然也影响到了男性)。女性是文书工作的主要劳动力,不仅在运用新技术上是先锋,在承受社会成本时也首当其冲,结果就引发了新一轮的“工作降格”现象,最终失去了工作。

以上这些研究主题只是胡斯手中分析工具的一部分,但它们提供的整体框架可以允许她研究非常广泛的当代话题:临时工制度,外包现象,公司失控不受管制,用监视软件来监督使用计算机的员工,通过计算机跟踪我们的购买记录来进行消费者剖析,“选择”的意识形态,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家务活”,孤独感和寂寞感,公共空间的丧失,工人阶级的解体和重组,工作与娱乐间的界限,等等。当你第一次阅读胡斯的作品时,定会为她能够涵盖当代生活如此众多领域而感到惊讶。

在这里还要提一下胡斯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她的预测非常有预见性。举例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她逆主流思想而动,正确预测到,远程办公和宽带电缆的采纳过程会相对缓慢,也预见到数据输入工作的高人气只是一个过渡期现象。她也准确指出,尽管70年代末普遍认为文书工作生产力会有巨大提高,但只有在不同信息技术之间的必要界面被建立起来以后才会发生,而80年代中期的主流观点却错误地忽视了这一点。胡斯之所以拥有远见卓识,是因为她不仅了解技术知识,也对技术变革背后的社会力量了如指掌。

胡斯的研究将资本主义向商品化不断演变的分析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对商品化过程及其深远社会影响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而胡斯的作品可以为我们提供正确的指引。

致 谢

这本书的研究横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期间有太多的朋友、伙伴和导师直接或间接地为内容撰写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我实在是无法一一点名列举,在这里只能向给予我最大帮助的一些人表示感谢。

首先,我在写作早期得到过不同女性团体的帮助,很多成员的理念和意见与我的想法慢慢汇集到一起,才形成了今天的研究,因此很难分清究竟是谁贡献了什么内容。先从最开始 20 世纪 70 年代在约克郡时说起吧,我首先要感谢西约克郡女性和新技术组织(West Yorkshire Woman and New Technology Group),特别要感谢裘德·斯道达(Jude Stoddart)、茱莉亚·迪克(Julia Dick)、丽奈特·威洛比(Lynette Willoughby)和莉兹·兰卡斯特(Liz Lancaster)等人;我还要感谢一个更加隐蔽的无名组织,由珍妮·泰勒(Jenny Taylor)发起,包括莎拉·佩利高(Sarah Perrigo)、珍妮特·伍尔夫(Janet Woolf)、珍·加迪那(Jean Gardiner)、雪莉·莫雷诺(Shirley Moreno)、莉·柯莫(Lee Comer)、玛莎·罗(Marsha Rowe)、格伦·帕克(Glen Park)、吉莲·雷西(Gillian Lacey)、格莉塞尔达·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和苏·威尔比(Sue Wilby)。后来在伦敦,我同时与三个组织接触,第一个组织后来正式重组为世界女性工人组织(Women Working Worldwide),特别要感谢其中的海伦·奥康纳(Helen O'Connell)和杰拉丁·利尔顿(Geraldine Reardon);另外一个组织起初主要由一群对就业有些研究的女性构成,其中包括珍·巴克(Jane Barker)、谢莉·亚当斯(Shelley Adams)、露丝·艾略特(Ruth Elliot)、曼蒂·克拉克(Mandy Clark)、珍·弗特(Jane Foot)和露西·德·格鲁特(Lucy de Groot);第三个组织主要由作家构成,包括莉兹·赫伦(Liz Heron)、玛莎·罗(再次感谢!）、艾莉森·费尔(Alison Fell)、罗西·帕克(Rosie Parker)、

艾莉森·米切尔(Alison Mitchell)和玛姬·米尔曼(Maggie Millman)。雪莉和露丝不幸英年早逝,我在此表示深深的怀念;很多朋友这些年来都和我一直保持着联系,支持我的事业。在这里我要向大家表达最诚挚的谢意。

接下来,我要感谢每月评论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的安德鲁·那什(Andrew Nash)、迈克尔·叶茨(Michael Yates)和其他同事的耐心与理解,还要感谢利奥·帕尼迟(Leo Panitch)的引荐。我还要再次感谢利奥和他在《社会主义年鉴》的副编辑科林·利斯(Colin Leys),谢谢他们敦促我腾出时间梳理观点。在我认识的所有编辑中,科林心绪最敏感,为人最谦逊,我要感谢他(富有建设性、措辞温和的)一丝不苟的批评与十足的耐心,他的友谊我会永远珍惜。我要感谢科林、利奥及其同事山姆·金丁(Sam Gindin),谢谢他们让我看到我的理论是有市场的。我还要感谢茜拉·罗波森(Sheila Rowbotham),多亏了她的启发,我才有了将文章集合成册的念头。茜拉,谢谢你多年以来的宽广心胸,谢谢你对我信赖始终如一。

最后,我要衷心向皮丝·鲁瓦克鲁(Peace Rwakeiru)说一声谢谢,是她从堆积如山的文档中找到了这本书中收录的原文稿,是她将文稿复印、扫描、校对整理,是她用了起码两年的时间彬彬有礼、坚持不懈地督促我审阅文稿并拿去送审。多亏了她,今天这本书才能面世。